

寒山寺古碑刻文化論綱

On the outline of ancient stone inscription culture in Hanshan
temple

陳道義

CHEN, DAO-YI

蘇州大學藝術學院教授、書法篆刻中心主任

摘要

自佛教西來，建寺院、開石窟時立碑、刻碑、藏碑已成為傳統，並且歷朝歷代時有增損。這些寺院所藏碑刻均成為中華碑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的文史、藝術價值各有千秋。據不完全統計，寒山寺的古碑刻（泛指 1911 年以前的碑刻）存世共有 29 種。本文提綱挈領地考察這些古碑刻與歷代文士、政要的淵源關係及其書法的歷史與人文價值，為將來的深入研究作引玉之磚。

【關鍵詞】 寒山寺、古碑刻、書法、文化

碑刻，是我國歷史上一種獨特的記錄、保存文明的方式，它是一種自然與文化結合最為直觀的形式，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文化藝術價值。碑刻所載之文字有時能補正史料之闕誤；碑刻書法曾一度展示了中國古代書法藝術史。文名千秋、銘刻實錄、書法形象等共同構成了中國特有的碑刻文化！這是我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門類，它主要反映了各個時代的社會制度、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等各個方面。

狹義上講，碑刻即辭書中所謂立於地表之上，刻著文字豎立起來作為紀念物的石頭；而廣義上來說，碑刻是泛指刻在石頭上的文字，那麼刻石、題名、墓誌、造像以及畫像上的題字等都在其列。本文所言碑刻文化即指廣義碑刻而言，主要涉及碑刻上文字內容的時代背景和文化意義以及碑刻書法的書寫者（乃至刊刻者）的歷史定位和書風衍變等。

據不完全統計，寒山寺古碑刻（泛指 1911 年以前的碑刻）存世共有 29 種（據性空主編《寒山寺碑刻集》），其中明代文徵明的《楓橋夜泊》詩碑已模糊不清，另有 1 塊宋代王珪（郇公）的《楓橋夜泊》詩碑，有記載但碑已不存（今有仿刻）。這些碑刻的文字內容涉及到：

（1）題字

如陶濬宣的“寒山寺”刻石，程德全的“妙利宗風”、章美的“寒拾遺踪”刻石，以及部分畫像石上的題刻等。

（2）詩詞、對聯、金剛經碑

其中以張繼詩碑最具特色，除了有記載而不存的王珪書寫的詩碑和文徵明書寫的詩碑殘石以外，另有俞樾書寫的最為著名；其它詩碑如程德全書寫的《歷代名人詩碑》，鄒福保、萬繩栻的詩碑等，至於岳飛、鄧石如的對聯刻石以及宋代張即之手書的《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等應是寺廟修建時根據需要而仿刻的。

（3）記事碑

主要是重修、新修寒山寺時刻碑以記及《蘇州府示禁占寺產碑》等，另有 1911 年重修寒山寺時出土的《吳縣鄉都義役田記》碑，乃明嘉靖辛亥冬十一月葛桷記

書，以及《社倉事宜碑記》等內容與寒山寺無涉，但既為寺內收藏，也應在統計之列。

（4）御碑

御碑，一般是指以皇帝親筆寫的字所刻成的碑。而寒山寺的兩方御碑是宣統三年重修寺院時由江蘇巡撫程德全補書的。其一是雍正帝御筆《寒山子詩序》，其二是乾隆帝御題《寒山曉鐘》，對於這兩方御碑我們應從其文容內容來認識其深刻意義。如雍正帝序寒山子詩：“朕以為非俗、非韻、非教、非禪，真乃古佛直心直語也。”（見《寒山子詩序》碑文），乾隆帝感慨寒山寺鐘聲“此意畫師何以狀？”（見《寒山曉鐘》碑文），二位帝王的金口玉言可謂不同凡響。

我們知道，中國古代宮室寺廟立碑由來已久，但起初碑的功用非以文字傳。《儀禮·聘禮》鄭玄注云：“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凡碑引物者，宗廟則兩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宮廟以石，窆用木。”從東漢開始，在石碑上書刻文字以記述墓主人姓名、官位、卒葬年月以及紀功頌德等，這是墓碑。東漢劉熙在《釋名·釋典藝》中解釋了碑的變化過程：“碑，被也。此本葬時所設也，施鹿盧以繩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求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無故（畢沅注曰：無故即物故）建於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就謂之碑。”至於題字刻石，則可追溯到戰國時期。由於碑刻內容和用途漸廣，因此後來又有功德碑、紀念碑、紀事題名碑、詩碑、宗教碑、書畫碑等等。自佛教西來，建寺院、開石窟時立碑、刻碑、藏碑已成為傳統，並且歷朝歷代時有增損。如河南少林寺藏歷代碑刻 204 方，時代跨北齊到民國；山西五臺山內 44 座大小寺廟中共藏有從唐代到民國的碑刻 794 方，洛陽白馬寺現藏歷代碑刻 40 余方等等，這些寺院所藏碑刻均成為中華碑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的文史、藝術價值各有千秋。就寒山寺古碑刻文化研究而言，我們可從以下兩大方面探討其歷史淵源和價值。

一、寒山寺古碑刻與歷代文士、政要的淵源關係

碑刻是歷史痕跡的重要實物載體。古代寺廟的建設與發展除了歷史文獻的文字記載之外，如有碑刻實物為證，那更是耳目一新，因為這碑刻直接訴說著寺廟的更替與興衰。魏晉以後，佛教文化逐漸融入中國傳統文化，我們可以從文學、歷史、美術、書法等多方面看到它的影響。因此，魏晉及以後的文士多與佛教文化有關連（如寒山寺前院石刻“寒拾遺踪”題撰者姚希孟，明代萬曆年間吳縣人，曾搜覽各種傳記史料，著成《佛法金湯徵文錄》十卷，包含了他一生奉佛的思想和功德）。他們吟詩作賦或奮筆書畫，也常用佛教題材或以佛理智慧深入其中，而寺廟為了提升自身文化形象，也樂於接納文士交遊，或專請文士賜下墨寶以垂久遠。寒山寺古碑刻中就有文徵明、唐寅、錢謙益、梁同書、俞樾、鄭文焯等文士的手跡，其中在廣大民眾中以俞樾聲名最大，因為他書寫的唐代張繼的那首膾炙人口的《楓橋夜泊》詩碑廣為人知曉。俞樾（1821—1907），字蔭甫，號曲園，浙江德清人，道光進士。官翰林編修，後因涉科考出題一事而被彈劾罷官。38歲始僑居蘇州，閉門著書，博通典籍，是晚清重要學者和書法家。從俞樾撰文的《新修寒山寺記》碑刻來看，俞氏與光緒年間寒山寺新修有很大關係，他說：“餘往年視學中州，辱有文字之契，故與余相習，因繪圖具說，述中丞（江蘇巡撫陳夔龍）之命求記于余。”又說：“吳中寺院不下千百區，而寒山寺以懿孫（張繼）一詩，其名獨膾炙於中國，抑且傳誦於東瀛。余寓吳久，凡日本文墨之士，咸造廬來見，見則往往言及寒山寺，且言其國三尺之童無不能誦是詩者。”可見俞樾對寒山寺與東瀛人的關係由來以久。於是這次新修寺時，俞氏才受以重托而補書《楓橋夜泊》詩碑，儘管他謙言“余所書張懿孫詩，遠不及衡山（文徵明）舊刻，而此記則尚能窺見中丞之意”。從此可以說，寒山寺因俞樾重書詩碑而更完美，而俞樾則亦因重書詩碑而更聞名。

《姑蘇寒山寺化鐘疏》之撰書者是明代著名文士、繪畫大師“明四家”之一唐寅（1470—1523），字子畏，號伯虎，他曾有一自用印“江南第一風流才子”。由於命途多舛，科考不利，唐寅生活飄泊不定，于46歲時皈依佛門，自號六如居士。《化鐘疏》中講到本寂禪師鑄鐘事，從“殿宇初備，銅鐘未成”可以推測，當時寒山寺又有一次大規模重建，這是我們今天所知最早的關於寒山寺鑄鐘的記載。

寒山寺作碑刻的著名文士還有錢謙益、梁同書等。錢謙益（1582—1664），字受之，號牧齋，常熟人，是明末清初時官時民的著名文士；梁同書（1723—1815），字元穎，號山舟，錢唐（今杭州）人，是乾隆年間博學多文的著名書法家，尚為人書碑文墓誌。錢氏所書《爭寺基帖殘石》以及梁氏所書《陰鷺文殘石》，都是寒山寺難得的碑刻資料，有待深入探討。

與寒山寺有淵源關係的政要，當數陳夔龍和程德全。陳夔龍（1857—1948），字筱石，貴州貴陽人，清光緒進士；歷任漕運總督、河南巡撫、江蘇巡撫、四川總督、湖廣總督、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等要職。1905年，陳夔龍在蘇州探訪寒山寺時，“入其大門，門庫且隘，登其大殿，榱桷粗存，觀於其左右，則荒葛崩榛中惟燕葵兔麥而已。”（俞樾《新修寒山寺記》碑刻）見此，“中丞歎曰：名勝之地，荒蕪至此，官此土者輿有車馬。吾曩者遠在大梁，緬懷茲勝形之歌詠，今臨其地，其能忍然乎？乃與僚屬共謀修葺。”誰料不兩月而告成。說來也奇，據寺內碑刻記載，陳夔龍官中州時夢得“蕭寺鐘聲”一景，後賦詩云：“宦味與禪悅，喧寂有殊致，夜半聞鐘聲，如在寒山寺”，詩境清越，寓意深遠，一時賓從皆吟賞。及明年，遂移江蘇巡撫，他喟然曰：“浮生如寄，宦跡如蓬，吾前詩其為之兆乎？”以佛家語而言，這是陳夔龍與寒山寺的“緣”。

程德全（1860—1930），字純如，號雪樓，四川雲陽人。捐班出身，1905年署黑龍江將軍，兩年後任黑龍江巡撫，宣統元年（1909）任奉天巡撫，翌年調任江蘇巡撫。在蘇任職期間，程德全對寒山寺情有獨鍾，繼前任陳夔龍之後，捐奉集資，又修葺了寒山寺。與陳氏相較，程德全對寒山寺的貢獻在於將寒山子的詩集整理刊刻，便於廣為流傳；又把歷代名人題詠寒山寺的詩整理刻石，共計唐至清代名人詩15首，分刻八石，最後有題記。這些詩詠題刻提升了寒山寺的文化形象；另外，程氏還延請歸隱故里的原甘肅學政葉昌熾（1847—1919）纂修《寒山寺志》三卷，上升到史學高度，這為後世研究寒山寺開了先河。史載宣統三年六月十四日，修葺寒山寺落成，程德全特以專車迎接各國駐滬領事，冠裳高會，極一時之盛。如果說陳夔龍新修寒山寺是一個“緣”字，那麼程德全呢？請看他撰寫的《重修寒山寺碑記》中的幾句話：“今世政治家訾宗教，宗教家亦訾政治，不知廢政治則宗教為無用矣；離宗教則政治為無本矣。寒山子詩云：報汝諸人，

各各努力。夫政治、宗教雖若有異，而要其終始，總不出各各努力之八言。嗚呼！時至今日，豈非臣下努力時哉？”這表明了他重修寒山寺的主要動機。1913 年，民國二次革命失敗後，程德全退出政界，寓居上海，閉門誦佛；



江蘇巡撫程德全



姚希孟題、章美書“寒拾遺踪”

1926 年他受戒于常州天寧寺，遁入佛門，成了一名居士，法名寂照。曾駐錫于蘇州木瀆法雲庵，這一舉止也算是應了佛家“因果”之語。

其他政要如宋代官至參知政事的王珪、清末任山西巡撫的陸鍾琦（曾官吳中十年）、官至翰林院侍講的鄒福保，以及明代第 82 位狀元、崇禎初年的禮部左侍郎文震孟（撰寫《寒山寺重建大雄殿記》碑刻，現已模糊不清）等等，目前暫無史料研究他們與寒山寺的淵源關係，有待於進一步挖掘。

二、寒山寺古碑刻書法的歷史與人文價值

古代立碑刻石皆隆重之舉，故碑刻書法也十分考究，一般都由書法家書丹後交刻工勒石。即便是政要、名士書寫，也都具備相當的書法功底。寒山寺現存古碑刻 29 種，其碑刻書法反映了宋代到明清（尤其是明清）的部分書況，具有歷史價值；書寫者大都是文士兼書家，有些政要如陳夔龍、程德全等所書碑刻也是標準的“館閣體”，又具有一定的人文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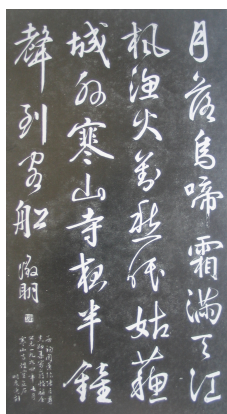
首先要提到的寒山寺古碑刻書法當然是北宋王珪的《楓橋夜泊》詩碑（稱張

繼詩碑第一石)，此詩碑雖早已不存，但史載明確。王珪既是政要人物，又是書法家，《中國書法大辭典》（香港書譜出版社，1987 年版）中有介紹：“王珪（1019—1085）字禹玉，成都華陽人。……舉進士甲科，為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兼侍讀學士。……嘉祐中，帝宴寶文閣，作飛白書分侍臣，命珪識歲月姓名。……歐陽修得雙幅大書，王珪夾題八字曰‘嘉祐御禮賜歐陽修’，仍於絹尾書‘翰林學士臣王珪奉聖旨題’。”但王珪書法真跡難尋，1996 年，寒山寺重刻的“詩碑第一石”，是據臺灣傅斯年圖書館所藏的王珪書《宋贈太師魏國公韓公神道碑》的拓片而集字複製。依筆者看，還不能盡如人意，故有待于發掘新的王珪書法資料再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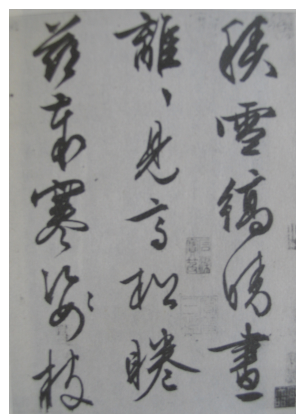
寒山寺“詩碑第二石”的書者是文徵明（1470—1559）。他是影響深廣的明代“吳門書派”盟主。其書法多講究應規入矩，注重法度，崇尚精謹；不僅行楷書筆筆到位、一絲不苟，而且對於奔放的草書也非常重視合乎規範。文氏所書張繼詩碑，早已“歲久漫漶”（俞樾語）今存不足十字，且字無全形，但仿佛能窺其行草書精神。今人周道振、張月尊夫婦集家藏帖之字，由性空法師立石、時忠德先生重刻的文氏“詩碑第二石”立於寺之塔院。筆者將其與原石比對，覺得新刻的書法字形與氣息均稍遜一籌。竊以為，根據現在的科技條件，結合文徵明的多種碑帖和殘石書法原貌，應能仿刻出更逼近原石的詩碑。



文徵明書《楓橋夜泊》碑殘字



文徵明書《楓橋夜泊》集字碑



文徵明墨蹟《自書雪詩卷》

碑殘字

寒山寺還存有南宋岳飛書寫的詩、聯碑和張即之的《金剛經》碑刻。據現有資料考察，這兩種碑應是重修寒山寺時加刻的，而非作者特意為寒山寺而書。岳飛書碑不知刻於什麼年代，但張即之的刻石應不早於光緒十一年，因為此石末尾有俞樾紀年跋文。這二碑均可從書法考證方面認識其意義。對岳飛墨蹟或碑刻存世者，學人多有爭議其真偽，如果寒山寺的岳飛詩、聯碑能正本清源，那將價值無比。記得蘇州曾有媒體報料某藏家將岳飛真跡《出師表》面世，有人就以寒山寺碑刻作為證據談其真偽鑒定，結果還是撲朔迷離。張即之所書《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墨蹟存世有兩種，一為南宋淳祐六年（1246）作，二為寶祐元年（1253）作（現藏于日本京都智積院）。經比對，寒山寺所刻乃為第一種，是張即之中楷之精品，其墨蹟而外又有拓本傳世，明清兩代不少名家為它題跋，如陳謙、趙宦光、董其昌、畢鼎臣、林則徐等，但寒山寺此刻石又多了俞樾於光緒十一年（1885）所作的跋文，這應是其它刻本所無者。其跋文曰：“宋張樛寮所書金剛經，明代曾以刻石，至國初已散失不全，息庵居士得其墨蹟而重刻之，所缺百卅八字，鈎摹其前後經文而補足之，了無補綴之跡。”可見，寒山寺的《金剛經》碑刻，應是由俞樾提議而據息庵居士的足本刊刻的。筆者所見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於1991年2月出版的《歷代書法名跡叢書·張即之書法選·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在經文順序上和字數的缺訛上，都與寒山寺所刻有些不同，故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

寒山寺古碑刻書法除了以上的重點作品與書家之外，還有很多值得探討的地方，如明代唐寅、文震孟的碑刻，崇禎年姚希孟題、章美書“寒拾遺踪”，以及道州何維朴書《重修寒山寺碑記》、狀元石韞玉的“現千手眼”隸書題刻等等，都是研究書法及書家的第一手資料，非常有價值。

以上主要從寒山寺古碑刻與歷代文士、政要的淵源關係以及寒山寺碑刻書法的歷史與人文價值來論述寒山寺古碑刻文化的。其實，這些碑刻的文字內容本身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如俞樾所書詩碑第三石的碑陰就記錄了俞氏對《楓橋夜泊》詩的考證；其碑側又刻有陳夔龍的補釋。還有幾篇重修寒山寺記以及寒山子詩、歷代題詠寒山寺等，也值得細細品讀和研究。由於本文是論綱，故只能從宏觀上闡述，權當拋磚引玉，至於面面俱到而詳細深入的研究，還要待日後功夫及其他識者之高論。